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李白詩集
杜工部集
大相公集
白香山集
黃庭桂集

李白

1214.22

39

3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李白集
杜工部集

李白 杜甫 / 著
苏渊雷 / 前言
张式铭 / 标点
B1/0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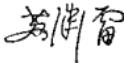


B

592157

不平，为了宣泄他那内心世界里长期所蕴蓄的郁闷以及解开理想与现实的葛藤，他只能选择诗这一武器，来控诉、来批判、来进行迂回的斗争。由于他涉及的生活面是宽广的，他所揭发的现实问题是深广的，他所传递感染的情绪是真挚的普遍的，所以才能够形成他那独特的沉郁顿挫、感激豪荡的风格；和李白的飘逸豪放、清新俊朗，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在语言艺术上，他同李白一样，达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境界，是真能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对于李白和杜甫的异同，鄙见尽如上述。已蓄于胸，形于言，数十年于兹矣。今岳麓书社诸君子发大愿，将李杜诗集璧合珠联，辑成精本，用飨全国以及全世界有心读者，此系魁明代《李杜合选》后一大创举。敬此三沐薰香顶礼，乐观厥成。承嘱为“导言”弁首，屡辞不获，率尔成篇，以呈大雅。狂瞽之言，倘有一可采，则实所深幸耳。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于海上拂水斋

编者附记：此次出版的《李白白集》，以巴蜀书社影印之北宋蜀刻本为底本，《杜工部集》以《四部备要》本为底本，均以其他通行本进行参校。凡底本中“一作”或某作之类字样，除个别非用不可者外，一般用圆括号取代；题下作者原注照录，后人注语则加括号。所编补遗，均由点校者加“按”交代出处。其他特别之处，亦予以注明。

李太白集

前 言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们继承了诗三百篇以来美刺比兴的形式，楚骚一派芬芳悱恻的风格，汉魏乐府抑扬顿挫的章法，以及六朝民歌清新婉丽的语调，而加以变化运用，又继承又创新，写出许多完整美好的诗篇。不但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宝库，而且也树立起一块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风雅以后有李杜。我曾有过这些不成熟的看法，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只有“风雅”两个字可以代表。风偏于反映民情，是抒情的；雅偏于批评国政，是讽谕的。换一句话说，风大体是一种民歌，浪漫主义写作方法多一些，雅大体是一种叙事诗，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多一些。因此，外国文学史上的理论搬到中国来，虽然也可以适用，但总觉得没有“风雅”两个字来得集中概括。我们历来有“风人”、“雅人”的提法：“风人蕴藉”，“雅人深致”。到了屈原，别出楚骚一体，这就叫做“骚人”。太史公引淮南王说：“酒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楚辞出来，形成了一种芬芳悱恻的风格，兼有风雅之长，兼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长。而李白和杜甫恰恰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但仍有些微妙的不同。李杜同是从风雅离骚变化出来，但李偏于风骚，而杜则偏于骚雅。李杜风格形成流派之后，几取风雅二字而代之。从此，诗人由于性分和学力关系，不免有所偏向。其间惟号称大家的，得体兼风雅，追摹李杜，蔚为一代的新声。换一句话说，就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互相结合，相得益彰。就此点

论，则风雅——李杜一条红线，始终贯穿于二千余年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中而未尝间断。

大凡历代诗人，多少都从李杜不朽的诗篇中，吸取精神的营养，学习他们高度发展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把诗歌这一鼓吹风雅、陶铸灵魂的形式，推向更灿烂而广阔的前景。在中晚唐时代，韩愈、李商隐、李贺、杜牧、李益这一派，都是作为风骚即李白这个系统沿袭下来的。到了宋代的欧阳修、苏轼，明代的高启、杨慎，直到清代的黄景仁、龚自珍，也还是沿着这个流派下来的。从杜甫那个系统说，当时就有元结、孟云卿，后来有元稹、白居易，宋代有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等，再下来清代有顾炎武、屈大均、杜浚等，都是继承骚雅即杜甫这个系统的。不过作为大家，唐如韩、李，宋如苏、陆，都能兼风雅李杜之长。韩愈、李商隐有学杜的一面，也有学李白飘逸豪放的一面，但在沉郁顿挫的音节方面，却又接近于杜甫。上面这些分析不过就其倾向性说，未可死然句下，一概而论。

再说，李杜二人风格虽有所不同，但就其作品所体现的精神实质看，无疑地同样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现实性，在这方面他们有最大的一致。一是对于祖国的爱慕，平时歌颂祖国壮丽的山河，战时怀念民族存亡的命运；二是对于人民的热爱，得意时唱着自豪的高歌，苦难时寄予深切的同情；三是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这些都是李杜二人所同具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这是因为，李白较杜甫早生十二年，所以还能赶得上那个在各方面都可以扬眉吐气的时代，五十五岁前大都过着狂歌痛饮、“飞扬跋扈”的生活；可是晚岁凄凉也亲眼看到河山破碎的惨剧，并且他自己也受谤磨难以死。

杜甫虽曾度过短期“裘马清狂”的生活，但是长安十载的乞食，已面临安史之乱的前夕，民生凋敝，险象环生，接着潼阳鼙鼓而两京沦陷，他的大半生就在流离颠沛中过去，因此感情更沉郁，体验更深刻，同情心也更深广了。李杜二人作品所反映的这些异同，可以说是他们所处时代错综复杂互相映发的结果。

现在先就李白这方面，分三点谈谈。

李白吟踪满天下。他早年所作《登锦城散花楼》、《登峨眉山》等诗且不说；就出川后的作品而论，那一片锦绣河山，都在他生花的笔下展现出来。他曾从荆门望蜀江，写道：“江水绿且明，茫茫与天平。”忆乘归旧游又写道：“开窗碧嶂满，拂晓沧江流。”他曾描绘过庐山的瀑布，说是“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也曾钩画出云霓明灭间的天姥峰，说是“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他爱宣城，就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他爱刻中山水，就说“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此外，把祖国的命运和自然结合起来，在胜利途中加以热烈歌颂的，元过《古风》第四十八首：“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一种乐观向上、欢欣歌舞的爱国主义精神完全体现出来了。

说到对民族存亡的关心，李白在诗中也是很深刻的。如《古风》第十九首，他首先写“西上莲花山”时飘飘欲仙的情景，紧接着就说：“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又如《猛虎行》里致慨“秦人半作庶地囚，胡马翻衙洛阳草，……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又如《经乱后将避地剡中》诗亦说：“四海望长安，草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那心情是沉重的，故怍心非常强烈。正如他在《南奔书怀》结尾时所说：“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直到长流夜郎半道释归时，他还沒有忘

记北上请缨；因病不遂时一再致叹“天帝壮士忘”。李白爱国忧民之怀，足与天下英雄相兄无愧。

说到对人民的热爱，李白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真挚深厚。那首被贺知章惊为“可以泣鬼神”的《乌夜啼》，就是同情劳动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名作，“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两句话传出了多少征夫思妇的哀怨。又如关怀妇女问题的就有《白头吟》、《妾薄命》、《长干行》等；塑造妇女勇敢形象的就有《东海有勇妇》、《秦女休行》等。同情旱天船工辛酸之苦的就有《丁都护歌》；选小嵩炉的矿工生活，在他的组诗《秋浦歌》里，也有生动的反映。珍惜劳动人民温暖的友情，就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跪送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慙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这些都是从深心里发出的感激之词。至于悲伤征人行役之苦的，在《古风》第十四首里就说：“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从劳动生产的角度看，诗人的感叹就更显得有意义了。

对于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凡是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诗人，没有不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加以反对的。唐玄宗开边政策的结果，特别加深了国家内部的危机。李白在《战城南》里说：“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大概是指开元末对吐蕃石堡城一役的战争。至于南诏战役，从大汉族主义出发，劳师远征，实在没有理由。李白在《古风》第三十四首里就明白指出：“快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耗两无声！”还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一诗里，指出连年战争的结果，使得经济破产到了“咸阳天下怒，累岁人不足；纵有微斗玉，不如一盘粟”的严重程度，因而“以此不安席”，果然不久发生了安史之乱。不义战争

对于人民的危害性，李白是看得极清楚的，难怪他要叫出“白骨成丘山，苍生亮何罪”（《忆旧游书怀》）的警句来了。

李白一生以任侠自许，他仰慕荆卿解纷、济世安民的诸葛亮和抗暴抑跋的张良、谢安等历史人物。这四个人，在其诗中反复出现，热情洋溢，不胜异代知己之感。在他六十二年的生涯中，有最重要的四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一是以布衣的身份，啸傲公卿间。到处漫游，诗酒留连，为知识分子在政治活动和生活方式上，创造了风流倜傥的典型性格。二是天宝元年应诏入京，展开上层政治活动；但因“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致为亲近不容，受谤放逐。三是放逐后与伟大诗人杜甫、高适在梁宋一带会晤，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惟李杜之间互相尊重，生死不渝。后来元稹和白居易，刘禹锡和柳宗元，乃至苏轼和黄庭坚这些人受李杜的影响，互相尊重，气类感召；对后来文人起着良好的示范作用。四是高卧庐山时奋起参加永王璘的抗敌军，虽因此被囚，然爱国精忠老而弥笃，写诗寄怀，要求尽最后报国的责任。可见李白一生，“光明磊落，风流倜傥”八个大字，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杜甫，千百年来研究杜诗的人，或称其为“诗史”，或尊其为“诗圣”，或美其为“精圣”。对于他的创作态度和方法，“寻章摘句，索隐探微，越来越深入，每多新颖可喜之论。今特拈出世人所乐道的：一为“诗外尚有寄托”，一为“无一字无来处”，一为“老去渐于诗律细”三点，略为发挥。

“诗外尚有寄托”，亦即诗中有人，为诗人世界观人生观所寄托。东坡曾说：“子美自许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荷茅道更商；春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窶山芝。’又云：

‘王侯与蝼蚁，同尽在丘墟，愚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按东坡所举三例，一为子美以天下为己任，洞见政理的淳漓；一为四皓虽名高，与人家国事，进退失据；一为死生大事，要留意向上一着，不得拖泥带水过活。此正子美“白首重闻止观经”之意。赵秋谷说：“诗人贵知学，尤贵知道。”（《读龙录》）此之谓也。后来，吴修龄《答万季野诗问》亦说：“诗如少陵《黑鹰》、曹唐《病马》，其中有人；袁凯《白燕》诗，脍炙人口，其中无人，谁不可作？”杜甫为王兵马使赋二角鹰，写鹰即写人。以“将军勇锐与之敌”及“荆南芮公得将军，亦如角鹰下翔云，为点题眼，乃不是寻常咏物，且移不到别处。写鹰即所以写三兵马使之勇锐相敌也。”（施补华《岘佣说诗》）据此，则刘梦得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柳子厚之“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低徊身世，感慨系之矣。王船山亦云：“诗文俱有主宾。无主之宾，谓之乌合。……若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予谓鸟之与？‘湘潭云尽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予许浑妄涉？皆乌合也。”“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得主矣。”（《姜斋诗话下》）盖此二句，正写杜甫达行在时的喜悦心情：“奔走奴宁，故曰影静；观察容之盛，则荡平可期而垂死之始苏也。”（李天语）有人无人之别如此。

再说，杜甫由予长期苦难生活的深刻体验，这就使得他能对广大人民饥溺同情、痛痒相关，那忧国忧时的涕泪更集中表现于《咏怀》、《北征》两首长篇的代表作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咏怀》）；“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这决不是同时诗人王维那种“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态度所可同日而语。关心政治、关心民瘼与否，正是杜诗成为“诗史”的关节所在。

《咏怀》一首反映出安史乱前社会实况和杜甫内心矛盾的斗

争，同时也是他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北征》写乱中旅途艰苦的经历与家境的困穷，同时表达他对时局的意见。二诗各有一种大议论，夹叙夹议，如太史公之纪传。昔人谓退之《南山》一首，仅是刻划山水，可以不作；《北征》“写情境，不可不作。以其有关天下兴亡，不能无此一篇划时代的作品也”。陈白沙说：“少陵只为苍生苦，赢得乾坤不尽愁。”这是一面。赵松雪补了一句：“江花江草诗千首，老尽平生用世心。”则又从另一角度，指出杜甫“诗外尚有事在”的错综复杂心情，可谓婉转微妙。

现在再谈“尤--字无来处”。黄山谷《答洪驹父》有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其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一段文字，几为江西诗派不传之秘。其实创作源泉有三：一源于性情，二源于生活，三源于书卷。山谷之论仅限书卷一隅，未为臆测。

杜诗之根于性情，随处可见。由于他长安十载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安史乱后又与人民一起流亡，到成都定居后经常和劳动人民接触，深刻的社会体验，使他的感情达到了仁民爱物、痛痒相关的境界；反映到诗歌上来，大而国家人民，小而妻子弟妹，乃至一草一木，一禽一奴，无不贯彻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并首先表现在自我牺牲的利他思想上。例如那首常被人们称引为典范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唱出广厦万间的宏愿来，而且带有极顽强的乐观主义精神，足以反映广大人民的呼声。又如《风凰台》一诗，杜甫也是以同样心情倾注的：“忍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愁孤愁。心以当竹实，炳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

此外，如为了照顾一位邻居老妇，特地写了一首诗送给新农

的位客吴郎，劝他不要插篱笆，好让她在杜甫去后仍能来院子里打枣儿吃。这种“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尚念四小松，蒼草易拘攢”（《寄题江外草堂》）；“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述书印过成都》）的精神，是多么婉转亲切，体贴入微，其中含着多少纯洁的爱啊！《同谷》七歌之寄怀弟妹，“裁取《九歌》、《四愁》、《十八招》诸词而变化之”（朱熹）。中夜起坐，万感交集；与《刑房太尉墓》之“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情深义重，真古伤心人语也。

其次谈生活。杜老当平生碌碌之际，间关秦陇，负薪拾橡，铺糟不捨，跋足荒山。困顿已极。这是一己艰虞，无劳记注。最难者如《三绝》、《三别》诸诗，沉痛处“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目击成诗，若有神助之，遂下千秋之泪”（王嗣奭《杜臆》）。这正是杜甫面向并深入人民生活，因而提高思想感情和艺术修养的产物。他那深刻广泛的生活感受和艺术概括力达到了高度统一，使他能以一波三折、百转千回的方式，写出《咏怀》、《北征》两首最具典型的诗篇。两首都用仄韵到底，增强沉郁顿挫的情调，中间有时设疑问答，有时铺叙行旅艰辛，最后运用对比法，写出了社会内在的尖锐矛盾，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扩次生活视野，关怀人民苦乐，正是杜诗伟大的所在。又如《上后园山脚》点出了“平原独憔悴”；《千秋节有感》说出了“满眼送波涛”；《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则曰：“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堰落风湍”；《南邻》则曰：“憀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这些都是从自己联系人民和草木禽鸟，借现象反映本质，极富现实感和人民性的作品。至性真情实感，自然流露，挟着深而广的感染力，给人们以意味深长的启发。生活之成为创作唯一源泉，于此益信。

再次，才轮到书卷。所谓“无一字无来处”也是重要一点。

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验功力，要非虚语。人或举黄山谷《咏猩猩毛笔》：“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两句，作为用事用典的例子。说：“平生”用《论语》“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几两屐”用《世说》阮孚“未知一生当著几两屐”；“身后”用张翰饮酒时语；“五车书”用《庄子》“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猩猩好著屐、饮酒，故借用之，以为语语有出处云。其实这些绝属修词范围，对诗的实质未起作用。杜甫书卷自足，惟不好掉书袋。如“富贵于我为浮云”拈来即是。所谓“作诗用故实，以不露痕迹为尚”。以熟为生，以古为新，用字用典使人不觉，此本诗人惯技，无可厚非。惟欲以此争胜，则入魔道。注杜诗者每谓杜诗必有出处，往往添上故事，减却诗好处。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不过说峡流倾注，上撼星河，含有兴象。施鸿保《读杜诗说》云：“《闻夜》或引杜修可说，二句皆用故事。《后汉·祢衡传》：‘声节悲壮’，《汉武故事》：‘星辰摇动，民劳之应’。今按：下句或用《汉武故事》，上句悲壮，第是常语。不必定用《祢衡传》语也。……说公诗者，每有此弊。”可供参考。王船山论诗甚峻削，尝谓：“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庭坚亦獭耳。……除却韦本子，則更无诗。”（《姜斋诗话》）盖讥东坡、山谷诗好用典用事，追求奇僻，致损心灵。又云：“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岂以‘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为出处耶？用意别，则悲愴之景原不相贷，出语时偶然凑合耳。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

（同上）可谓一语破的。

最后，谈谈“老去渐于诗律细”。杜甫对“句法”、“诗律”，十分重视。常说“法自儒家得，心从弱岁裁”；“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晚年诗律尤细，今分三点来说：

一为谋篇命意，组诗的结构。《秋兴八首》，为杜甫晚年流寓夔州时期作品。孤城落日，感慨万千。知其有意谋篇，经营

惨淡。一事而叠为八章，重重钩摄，节节依持。其间接笋合缝处，天然凑泊，了无斧凿痕。按八首以第四首“闻道长安似弈棋”为关键，前半指朝廷之变迁，后半指边境之侵逼；北忧回纥，西患吐蕃，追维往事，不胜今昔之感。“故国平居有所思”，则结本章以起下四章。“有所思”破空而来，以下曲江、蓬莱、昆明、紫阁，皆所思者；至第八首结句“白头吟望苦低垂”，此“望”字与“望京华”望字相应。笔干气象，皆何其壮？头白低垂，今何其急？诗至此，声泪俱尽，故遂终焉。通过上面分析，则知杜诗此种章法，皆自《大雅》中来。藏锋不露，接合无痕。组诗至此，叹观止矣。

二是变格创体。杜诗七言律以《登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代表，绝句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为代表，皆杜所独创，迥异时流者。《登高》一首，胡应麟云：“通章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此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又说：“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实一意贯穿，一气呵成。骤读之，首尾若未尝有对者，细绎之，则锱铢两毫发不差；而建瓴走坂之势，如百川东注于尾闾之窟。至用句用字，又皆古今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真旷代之作也。”按此诗八句皆对，起二句对举之中，仍复用韵，格奇而变。又《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顾震说：“此诗之‘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于仓卒间写出欲歌欲哭之状，使人千载如见。”律中带古，纵横跌宕，一气流注，不见句法字法之迹，自是杜甫七言律创格。

七绝中，除《江南逢李龟年》及《赠花卿》等首，“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黄生），与唐人绝句同一机抒外，其《漫兴》及《江畔寻花绝句》，破弃声律，别是一种句格，实为唐人绝句变体。至绝句作两联，如“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

更……”（《漫成一首》）、“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等，皆杜甫创格，开后人无数法门。

三是琢句用韵。炼字炼句，暂且不谈。有时以例装句法，崛强取胜。如“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实为“听猿三声泪实下，奉使八月槎虚随”，此与“香稻啄余鸕鷀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同格。《白帝城最高楼》之“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游”，亦是倒装句，应言“龙虎霾云卧坼峡，鼋鼍抱日游清江”，倒装后句子更健，意境更高。

至于古律拗句或称“吴体”，杜甫尤优为之。黄山谷尝以“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亦梦时候”，平生得意；实与老杜“渴盘蟹欲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相类。杜甫拗体可举者更多：“九江落日醒何处，一柱观头眠几回”，“一双白鱼不受钓，三寸黄柑犹自青”；“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皆有啸傲天地、凌轹古今之概。按“落花”二句之所以为佳，正以其能通过形象，写出昼夜春深之境耳。下一“静”字，“深”字，便觉全体披露，现境眼前。《晚发公安》有云：“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远道无前期。出门转盼已陈迹，药饵扶吾随所之……”卢世㴶评云：“更瘦更狂，摇曳洒酒，真七言律中散仙也。”（仇注引）王嗣爽也说：“七言律之变至此而极妙，亦至此而神。此老夔州以后诗，七言律无一篇不妙，真山谷所云不烦绳削而合者。”（《杜臆》）再如《移居公安小馆》一首：“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复乌啼。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西渡桂水闻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则真七言律拗体之尤者矣。

至用韵方面，五平五仄，交替使用，长篇换韵，参差句法，杜诗变化尤多。晚年诗篇，有“诗律细”与“浑漫与”两个方面，所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

采花鸟翼深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遣疑》)。夫子自道，二语足以尽之矣。

总之，唐代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也是古典诗歌最有辉煌成就的时代。“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几乎同时出现当目的诗坛，恰恰是反映出那个充实而有光辉时代的两面鲜艳无比的旗帜。他们不但批判地继承了风雅乐府以连六朝声律的优良传统，而且广泛地吸收域外音乐舞曲和南北民歌形式，天才地创造出惊心动魄、回肠荡气的诗篇；既总结过去，同时又为中国诗歌艺术开辟出一条宽广而坦荡的道路。他们有时用一种清真刚健的调子，歌唱那统一繁荣，乐观向上的时代；有时又以诗人特别的敏锐，挟着沉郁顿挫的感情，预感到盛极而衰的苦难，并且寄予深切的同情。一句话，弥漫着当日整个诗坛的是一派积极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而李白和杜甫又恰恰是通过这错综复杂的时代遭遇和生活实践，各以特异的风格，在最大的一致上，体现了那个不平凡时代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动荡的灵魂。这就是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为什么能够在悠久的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避出时流，站在诗歌艺术的最高峰，手挥目送，以全力陶铸灵魂、鼓舞人心的缘故。

作为飘逸豪放这一类型的李白诗歌，那扬眉吐气的神态，鲜明生动的形象，深入浅出的语言，流转自然的情调，一句话，结合着现实主义的浪漫精神，正是李白长篇独创中所反映出的“盛唐气象”，为我们所永远不能遗忘的典型性格。说到杜甫风格，“沉郁顿挫”诚然是杜老甘苦自知的说法。我想不妨把他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首小序里所提到的“豪荡感激”四字拈出，作为补充。杜甫以诗为性命，一再说“药裹关心涉忌康，花枝照眼句还成”(《酬郭十五判官》)；“悲极本怨诗道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为了排遣他那对于不合理社会的愤怒与

李太白集目录

卷第一 集序 墓志

草堂集序	李阳冰(1)
李翰林集序	魏颢(2)
李翰林别集序	乐史(3)
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	李华(5)
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刘全白(5)
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范传正(5)
翰林学士李公墓碑	裴敬(8)

卷第二 歌诗五十九首 (古风)

古风五十九首	(10)
--------	------

卷第三 歌诗三十一首 (乐府一)

远别离	(20)
公无渡河	(20)
蜀道难	(20)
梁甫吟	(21)
乌夜啼	(22)
乌栖曲	(22)
战城南	(22)
将进酒	(22)
行行且游猎篇	(23)
飞龙引二首	(23)
天马歌	(23)